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海外务工的福建人：三十年，迫切改变命运的心回到原点

随着移民浪潮翻滚的命运究竟由谁做主，只有被打湿过的人才真正知道。

特约撰稿人 张子竹 发自福建 | 2018-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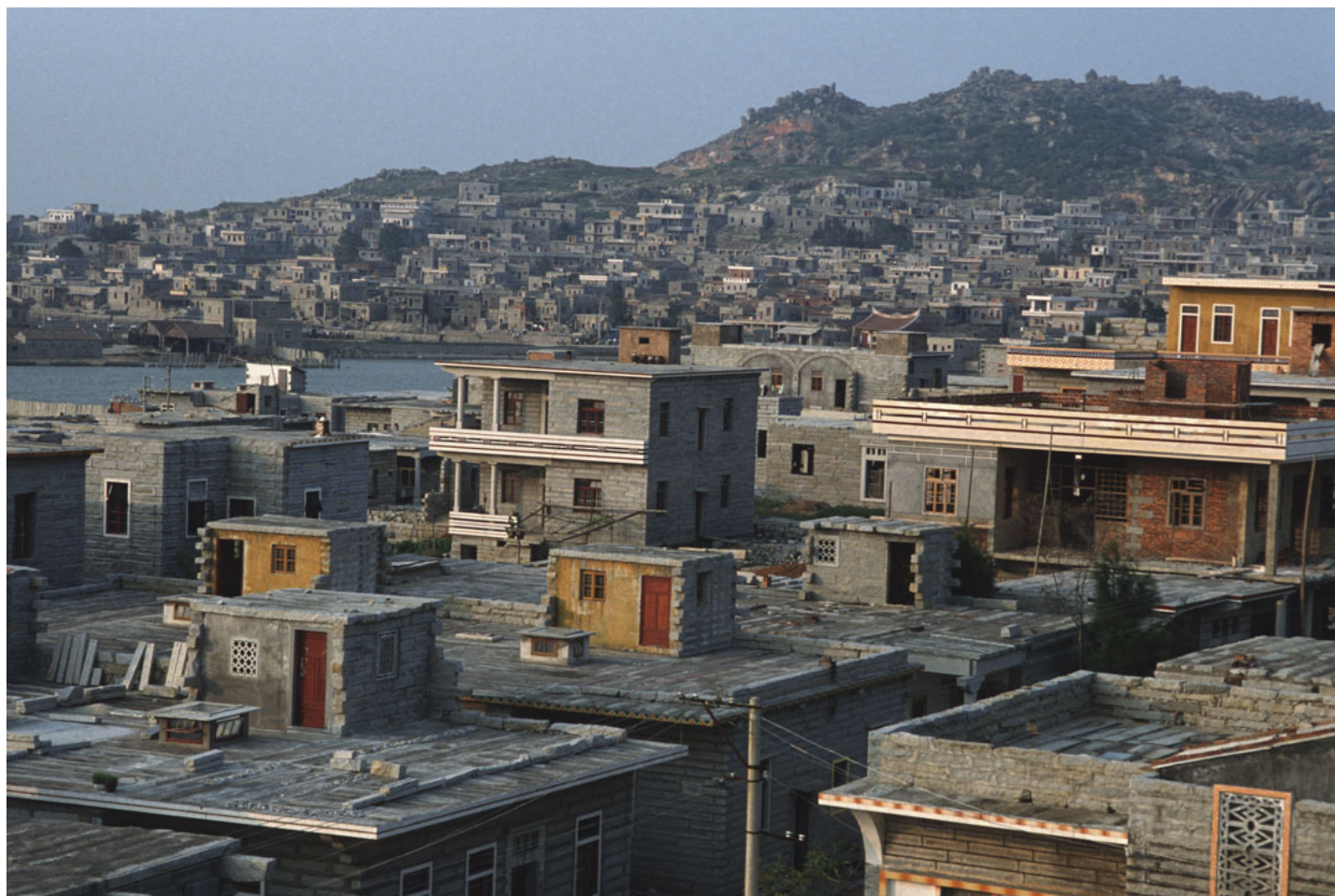


吴卫和林同是福建老乡，也是高中同学。他们二人都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远渡重洋去务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从海外归乡，吴卫坐拥两千万身价，林同却两手空空。图：Tsengly / 端传媒

吴卫和林同是福建老乡，也是高中同学。他们二人都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在90年代远渡重洋去务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从海外归乡，吴卫坐拥两千万身价，林同却两手空空。

“我现在是无产阶级啊，什么都没有，”福建高山镇一家闷热难耐的小饭馆里，林同夹上一口菜。坐在他身旁的吴卫，从黄色铁罐里抽出一支烟，港产的红双喜，点上，然后倒了一杯冰啤酒。

“我们算是时代的弄潮儿，”吴卫感叹，“考大学，出国热，老板热，什么都赶上了。”在中国的移民大省福建，留洋文化和人情纽带撬动一代又一代急于改变命运的心。然而，随着浪潮翻滚的命运究竟由谁做主，只有被打湿过的人才真正知道。



紧张的台海关系也被认为是福建作为“前线地区”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是邻省广东的三分之一。图为1992年的福建。摄：Gerhard Joren/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一座座高楼都是海外淘回来

林同和吴卫的第一次命运分岔发生在90年代初，一家生产LED灯的台湾企业在他们的家乡招工。那时改革开放的大潮袭来，林同刚摆脱了长达八年的体制内岗位，渴望在市场经济里自由地挣钱。

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他的父母兄长都是农民，林同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大学生。他在1980年考上全国重点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主修无线电工程，后来又在航空航天部读发动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直升飞机研究所做军工，可是过得很别扭，“待遇低，上下班还吹军号，”一个月收入54元，杯水车薪。此前研究所人才流失严重，等林同那届新人进来之后，所长抛下狠话：“你们年轻人想走，八年之内都不要谈。”

而八年后，台湾企业开出800元人民币月薪的待遇，却让年轻气盛的林同一口拒绝：“我认为我值一千。”

与台湾企业的价码谈不妥，林同之后到保安工程公司做过技术，在泉州卖过改装对讲机，有人给他开出1500元的薪水，他也没去。那时他还是年轻气盛，琢磨着自己做生意。

“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吴卫不认同林同的选择。吴卫应聘同一家公司，接受了月薪450元的工作，“我以前才拿72，有400就很满足了。”

那时吴卫在福州市一家国营机械厂做工程师。本来有个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却因吴卫不是城市人、买不起房而分手。吴卫下决心要赚钱，他从国企办了停薪留职，辗转几家民营企业。

1989年，吴卫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同年两人结婚，很快有了孩子。他再一次感到没钱的压力：“人家都有房子，我们没房子住。你愿意老婆孩子跟着你颠沛流离吗？”

吴卫和林同都在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镇长大，这个位于福建东部沿海的小镇因地势高而得名。走进林同家所在的高山镇塘北村，三层往上的西式楼房在村道两旁一路延伸，一幢挨着一幢。阳台间带有雕纹的圆形立柱，院门口挂着石刻的金字对联：光宗耀祖，子孙兴

旺。以前村里盖房的标准配置是“三层半”，三层住人，半层用来晒衣服。后来攀比之风愈烈，东家盖四层，西家就盖五层，楼房高矮逐渐成为衡量财富的标尺。

但这气派只在门面。许多楼房院门紧闭，偶有敞着门的人家，可见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条瘦狗在屋门附近原地转圈。“这个村子，除了老人就是孩子，没有年轻人。”林同说。

虽身处沿海，但福建地貌多山，人口分散，中心城市发展不足，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城市化基础薄弱。上世纪80年代以前，紧张的台海关系也被认为是福建作为“前线地区”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1990年，福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是邻省广东的三分之一，基础设施投入只有广东的五分之一。经济的滞后和渴望海外的传统催促着一代又一代福建人离家打拼，四处扎根。

“那个时候（出国和不出国）差距太大，你用眼睛都看得到，不用人家讲。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哪里来的钱？就是海外淘回来的，”林同说。

高山镇便是著名的侨乡。塘北村口的牌坊、村里的路都是华侨捐钱修建的。华侨的传奇故事撩拨着年轻人的心。林同最敬佩的就是祖籍福清的已故印尼富商林绍良。生于农民家庭的林绍良1938年远赴印尼投奔亲人，从一个花生油店学徒开始起步，建立横跨多界的家族财团。鼎盛时期，林绍良曾是印尼第一富豪。

在林同心里，“跨出国门是第一步的”。但老同学吴卫先于他迈出了第一步。1992年，吴卫凑了几万块钱，在蛇头的帮助，只身来到日本东京。

而林同那时还犹豫着。三十年后再回忆这段经历，林同总结自己，“思路还是有的，只是没有踩到鼓点上”。



90年代是日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打一小时零工能挣1000日元（约60元人民币），一天的收入已经赶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个月的薪水。图为1994年的日本东京。摄：Bernard Annebicque/Sygma/Sygma via Getty Images

在日本，一天的收入是老家一个月的薪水

“什么都新式、都花样，都感觉到比中国好，”回忆起那个灯红酒绿的东京都，吴卫觉得，“自己这种小地方出来的人，没有遗憾。”

他背着一个面包，在东京的大街小巷穿行，用刚刚学会的几句日语问：需不需要临时工？最开始，吴卫白天上语言学校，晚上在寿司店帮工。后来学校干脆不去了，白天做清扫，下午和晚上在汽车配件厂做流水线工人。

吴卫是奔着劳动力差价去日本的。90年代是日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打一小时零工能挣1000日元（约60元人民币），一天的收入已经赶上福建老家普通人一个月的薪水。

他有管理车间的经验和察言观色的机敏，在汽配厂从流水线工人做到课长。工资涨了，老板还邀请他白天也来上班，吴卫推脱了。“小时工资高一点。日本公司社员要缴纳税金，还要扣你什么东西。他们社员福利好，但是我们不要，钱可以现拿。”

卖力的时候，吴卫一天做16个小时，一个月挣四万人民币。那是1995年，上海的在职员工年均收入不到一万。

除了拿时薪，退掉的税、报销的车费都逃不过吴卫的精打细算。日本公司提供交通补助，一个月花了两万日元，他就报两万五。后来发现复印件也能蒙混过关，他就一份票据三家报。他觉得日本人有点“傻”、“不懂变通”。

他没有精力也没有环境交朋友。和中国人一起租住的狭小房间里，六套榻榻米七个人分，上白班的人回来，赶晚班的人又要出去，谈天说地的工夫几乎没有。他唯一的“朋友”是在清扫公司结识的一个日本大学生，对方比自己大上五岁，没有结婚。俩人交流的话题从不涉及各自生活，出去喝酒也是各付各帐。直到离开，吴卫对这份友谊的感觉始终“算不上好，他不交心”。

吴卫来日本办的是留学签证，期限只有半年，之后便作为“黑户”蛰伏下来，期间没能回家看过一次。“去的长就不想了”，他说。只有工资源源不断地流回福建老家，凭借这些钱，

妻子在福清盘下一家旅店，又陆续攒下数家房产、店铺，最终积累了两千万的家业。

夫妻俩的经济头脑并不被彼时的家乡人所理解。乡下人赚了钱就要盖房子，随着像吴卫这样在海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外表光鲜的楼房成为家族在外掘金发迹的炫耀之本。吴卫的父母至今责怪他没有把房子盖在老家，给老人家撑起脸面。“起初我父亲很疼爱我，最后就疼爱我的小弟，为什么？他把房子盖在乡下。”

1998年，在日本打黑工的第六个年头，吴卫决定回国。“身体不舒服，感觉不能够以命换钱。”睽违六年的家乡变得有点不认识，“那时候福清有人叫我吃饭，叫我带‘卡路’出来，就是二奶。我说我没有卡路，人家说没有二奶还敢出来，丢不丢人。”

林同是跟着吴卫后面回国的。1996年，他终于实现了出国的想法，到东京筑地市场运货打工，同时在一家跨国株式会社的厨房帮工。两份工作的月收入加起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本以为也能挣钱回家长长脸面，没想到两年后，便被发现签证过期，不得不打道回府。

“运气不好，”林同叹气。至今回忆起来，他的声音仍掩不住沮丧：“不想提，一辈子都有阴影。”

2001年，已实现财务自由的吴卫在家乡讨了一份数学老师的工作，过上清闲的生活。而林同海外掘金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中国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随后南非的中国移民益增，2008年金融危机，南非市场动荡，兰特大幅贬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杯，财政吃紧，经济愈发不振。图为2010年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场，迎接当年即将举行的世界杯。摄：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

在南非打拼，“生活就像服刑一样”

不久前，林同和吴卫才重新取得联系。林同的大女儿今年读初一，碰巧是吴卫教书的学校。林同四十出头才讨到老婆，如今两个女儿都在福清读书。吴卫有次开玩笑，四十岁结婚“不正常”，林同脸上掠过一丝尴尬。

“你怎么结婚呀，你天天在路上走，”林同说。长期的漂泊还是次要，“关键还是会不会挣到钱，你要是挣到钱，现在结婚也来得及。”

2003年，一直没有折腾出名堂的林同决定去南非闯一闯。他在当地租了一辆车，带着几个侄子、外甥四处寻找合适的店铺，想做超市或加油站。他的英语底子不错，一些老家的亲戚晚辈都信他。可是，整整一年都没有收入。

中国和南非在1998年建交，随后南非的中国移民益增，至2010年，加上非法移民总人数超过50万。这其中，福建移民占到三分之一。

比起日本的处处规范，南非的移民生态更为“野蛮”，是“险中求富贵”。比他早来的福建商人大多靠外贸服装、旅店、杂货铺等小本生意起步。中国人喜欢低价倾销，打价格战，生意厮杀得很惨烈。为了增加盈利、躲避竞争，不少人把店开到了城市以外的穷乡僻壤，“占山为王”、“你店开在他旁边不行，开在他对面不行。你开了他就揍你啊，不让你开，你没办法。”

到南非的第二年，林同和侄子们接手了一间加油站，这类生意在当时的华人圈里算是首例。前任老板因为年纪大了不想操劳，愿意用70万兰特（100万人民币）的价格将手上资产尽数转让。加油站后面连着一幢单层别墅，别墅旁边还有泳池，是笔难得碰上的划算买卖。

加油站位置优越、没有竞争对手，便利店生意也不错。红火的时候，一辆60人座的大巴刚进来，下一辆大巴已经在排队了。林同一年能挣近百万人民币，有房有车。日子顺的时候，林同觉得南非生活有民主、也自由，比起国内悠哉许多。

但是，对安全的担忧总是萦绕在他心头。中国人现金充裕，又较软弱，因为很容易从口袋掏出现钞，中国人被当地的劫匪称为“ATM机”。林同就不止一次成为打劫的目标。有一天晚上，一群亲友打牌归来，在别墅门口被匪徒堵上了嘴；还有一次，趁着家里没人，小偷撬开了门。

林同算是运气好。第一次，匪徒摸黑进屋的时候，惊醒了熄灯睡觉的林同，情急之下，他看准机会，拼劲全力扔出一支铁棍，用凄厉刺耳的金属噪声把匪徒吓走；第二次，是恰好有警车从附近经过，警笛吓走了小偷，才化险为夷。针对华人的打劫几乎每天都有，林同心里清楚，这些案件背后大多“都是华人提供信息然后分赃”。

不少华人都在自家店铺安装了“防劫门”，这是一种用钢铁焊接的防盗门，不管营业与否，都要牢牢关好。林同则雇了一个南非警察做兼职保安，警察配枪，心理感受更安全。但警察也不能绝对信赖，索贿的事时有发生，有次林同出门忘了带身份证，碰上警察，被敲诈了2000兰特。

经济说变坏就变坏。2008年金融危机，南非市场动荡，兰特大幅贬值。接着是南非足球世界杯，财政吃紧，经济愈发不振。兰特的持续贬值推高了买油成本，南非国民消费力减弱也让生意愈加难做。十几年前1兰特换1.3元人民币，到如今1兰特汇率只能换到0.4元。再怎么赚钱，也抵不过汇率贬值。

“不赚钱的都回来了，都在卖了，但卖不掉，”很多人熬不住了，林同不肯说他亏了多少。他只说，以前在南非当老板的男人是“抢手货”，如今都没什么吸引力了。

2009年，林同的侄子、二十出头的林峰来到南非，对他来说，出国已经成了追随父辈的惯性动作。他在家乡的职高毕业后，晃荡几年找不到正经营生，来到南非后盘下一家酒店，生意很快就黄了，周围治安不好，林峰被打劫了两次，头还被枪柄敲了。

他又辗转开了第二家酒店、超市，生意还能维持，但实在是无聊。“生活就像服刑一样”，每天开门关门，一直重复。林峰觉得浑浑噩噩，“到了那边（南非）的时候，有时候会想，怎么到这边了？”

一代又一代外出务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难题：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从前那么精彩，劳务差价几近消失。他们要去哪里书写华侨传奇呢？

2016年，林同和侄子林峰决定打道回府了。



一代又一代外出务工的福建人遇到了难题：外面的世界早已不像从前那么精彩，劳务差价几近消失。图为2016年的福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财富

林同回国的这一年，吴卫辞去教书的工作，过起吃饭喝酒、爬山行脚的生活。林同却意识到自己在国内“已经没有机会了”。“比方说请客巴结人，你在外面呆了20年，你做不来的。”

和林同大哥的孩子林平聊起林同，他们早期曾在南非共同经营加油站。“他的头脑太好”，林平尴尬地笑了两声，“我们这边，头脑太好了不一定能挣到钱。头脑不好的话，三十也赚，五十也赚。”言下之意，出门讨生活的人，有时想法太多、眼界太高，反而抓不住财富。

这些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林同说：“没有挣到钱，有点遗憾。”

三言两语，钱字不离口。林同是“见过大钱”的，出走半生，却未能衣锦还乡。如今租房居住，孩子在国外出生，回国只能读私立学校，学费开销亦成负担。

“ he现在是50岁的想法，跟我差20年。”吴卫谈到老同学林同，“我30岁想为孩子多挣钱，现在是享受人生。你说他苦不苦？”另一边，林同形容吴卫的悠哉态度是因为站在“混凝土上”，而自己毕竟站在淤泥里面讲话，“底气不足”。

和父亲的敢闯敢拼不同，吴卫的儿子如今在福州一家国营企业上班，不愁吃穿，生活安稳。吴卫觉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已让下一代失去“父辈那种创业精神”，年轻人没有生活压力，出国吃苦便不是必须。

林同和吴卫聊起“遥想当年”的时刻，颇有些遗憾，比方，“我当初要是圆滑一点，我就入了党”，或者，如果去了那个台湾公司，“我起码是采购部经理”云云。

只是往事不容得重来，林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命的问题”。

在此刻，他们二人的心回到了原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同、吴卫为化名)

“异乡人”栏目现在面向读者征集稿件，若你愿意分享你的异乡故事，请发送邮件至
editor@theinitium.com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恚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中国式“离散”：移民是他们的灵丹妙药吗？

家乡还是异乡？当妻子、孩子、爸爸都成为微信上的一个头像，他们告诉自己：暂时分离，只为积攒资本……

他乡的少年：坦桑尼亚的小中国人

她懂中文、斯语和英语三门语言，觉得留在非洲有优势，即使遭遇抢劫也没有改变留在非洲的想法；他的网名是一个“孤”字，虽然是随意选择的字，却说出他在非洲的心境。

异乡人——邹思聪：时代剧变了，而我们都设法活下去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类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异乡人——迪迪：为什么留在家乡的儿时伙伴，看上去比在外拼搏的我更加“自由”

我从小对“最好的”有一种执念，要离开家乡小城，到最好的地方去，看最好的世界；而她却随遇而安，几经波折，留在家乡，我行我素地生活着。

异乡人——唐南发：身为华人，对“排斥和歧视”知之甚深，我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

在马来西亚长大，我鲜有异族朋友；在伦敦生活，亦非社会主流……那些经历告诉我，即便游走在社会边缘，也有权参与这个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